

# 《叶普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传播

林 辰

**摘 要:**《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晚清至五四时期,通过介绍性的文章及文学评论,其主要内容被介绍进中国社会;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片段节译和译著开始出现;建国后,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其译介经历了高潮和低谷期;改革开放后,日益开放的接受视角使其译介进入了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历史的百年沉浮,《叶普盖尼·奥涅金》最终构筑了其在中国的经典地位。

**关键词:** 叶普盖尼·奥涅金; 译介; 传播

**作者简介:** 林辰,女,文学博士在读。(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5) 01-0109-08

《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有趣的是,这部被别林斯基誉为最富有“民族性”<sup>[1]</sup>的作品对于有着浓厚“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来说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独特魅力。从1897年《时务报》的译文首先提及了《奥涅金》一书,到1941年第一个全译本问世,再到已有十多种中文译本的今日,这部巨著的译介与传播也随着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变迁而跌宕起伏。《奥涅金》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国前、建国初至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至今。

## 一、建国前:初步译介

晚清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企图利用西方先进文明拯救风雨飘摇的中国。故以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为先导,学界拉开了国民启蒙运动的序幕,而文学,特别是翻译文学则成为了“开民智”、“立新民”的手段。俄国文学也同美、欧、日等其他国家的文学一道,被介绍进中国社会。

1897年《时务报》所刊发的一篇译文——《论俄人之性质》最早提及《奥涅金》:“夫俄人之好凭空论事,而少忍耐之力。诗人伯是斤所夙称也。其言云,昔有埃务刷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为大言,耸动人耳目,崇论宏议,冲口而出,然未尝实行其万一,居常蠢尔无为了此一生。是为俄人之情状也。”<sup>[1]</sup>此处的“伯是斤”即普希金,而“埃务刷尼”即为《奥涅金》同名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介绍俄民族特征,虽非文学评论,但其中所点明的奥涅金的个性特点,如“本多才之士”、“然未尝实行其万一”、“居常蠢尔无为了此一生”等,概括了主人公“多余人”的性格,展示了这部诗体小说反映俄民族特征的现实主义手法。而第一个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奥涅金》的是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他肯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并从内容和语言形式上对《奥涅金》做了概括性介绍:“尔后巨制,曰《阿内庚》(即《奥涅金》),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sup>[2]</sup>继而探讨了《奥涅金》与拜伦诗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间的继承关系,推崇浪漫主义诗歌对社会的积极作用,鼓舞中国知识分子将文学作为武器来反对封建专制。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受《奥涅金》的影响相当深远。

由于译诗的困难和“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普希金的小说作品首先在中国流传开来,他的著名小说篇目在20世纪初的前20年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sup>①</sup>而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诗体小说《奥涅金》的译介则稍显滞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初,一些文学评论著作和介绍性文章出现了对《奥涅金》故事梗概、创作背景的介绍,例如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汪恂然的《俄国文学ABC》等等。其中,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用近两页的篇幅介绍了《奥涅金》,他认为这部“传奇小说”是“普希金最有名的著作,俄国文学能表现当代派调的,亦从这一部著作起”,<sup>[3]</sup>并分析了主人公“沃聂琴”(即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及其社会原因。1926年孙良工编《世界文学家列传》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根据日本多惠文雄的《世界二百文豪》改编,其中就有普希金的专章介绍,谈及了《奥涅金》的创作源起和创作经过。<sup>[4]</sup>1928年由查士元、查士骥译述的《世界诗歌名著提要》,据日本木村一郎等著《世界名著题解》编译而成,认为《沃奈金》(即《奥涅金》)是普希金的“杰作”、“吐着全盛时代的精力的诗篇”,介绍了著作的起始创作时间、出版年等具体细节、并有分章梗概,将奥涅金和达吉雅娜的爱情故事用近两千字的白话文较为详细地演绎出来,可以看作是由《奥涅金》改编的白话言情小说。<sup>[5]</sup>在一定程度上普及推广了这部作品,是诗歌体翻译的先声。

普希金的译介在1937年普希金百年祭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这一年2月,上海建成了普希金纪念像,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中国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大型的纪念会。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册集》,上海光明书店出版了瞿洛夫编辑的《普式庚创作集》,生活书店出版了《普式庚研究》,文化生活社出版了《普式庚短篇小说集》。此外,《译文》、《文学》、《中苏文化》等杂志还特意推出了普希金百年祭特辑,“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这一年堪称‘普希金年’”。<sup>[6]</sup>

《奥涅金》的翻译作品也较多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开始时主要是著名片段的节译。例如,达吉雅娜的独白就有林焕平的译文和史原的译文,分别刊载于1935年上海出版的《东流文艺杂志》(第一卷第3-4期)和1935年3月10日广州出版的《中山日报》副刊。1936年,夏玄英节译了第1章的第45至50节,译名为“尤根·奥涅根”,刊登于《诗歌生活》第2期第87-90页。而1937年的《中华月报》的第5卷第2期上刊登了劳荣所译的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信。

1942年,《奥涅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应运而生。译者为甦夫,译名为《欧根·奥尼金》,起先刊登于《诗创作》1942第7期,后由桂林丝文出版社在同年9月出版。根据书中的注释和标题来看,应该参照了当时流行于中国的两种外文译本:涅克拉索夫(N. V. Nekrasov)的世界语译本和日本米川正夫的日译本。虽然甦夫的译本“文字苦涩且粗率”、“与原诗出入很大”,<sup>[7]</sup>并有不少的错译,例如将席勒译作了雪莱,将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拉丁名菲布斯(Phoebus)错认为是另一个神灵等,且只译了前8章,内容相对不完整,但译者敢于在各种资料都不全面的20世纪40年代初,首先尝试形式和内容上都颇具难度的“奥涅金诗行”,可以说极具勇气和热情,另外,译者将原本各章空缺的诗节都填补起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编了原作,但为《奥涅金》的普及做出了贡献。至此,《奥涅金》一书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1944年,首个由俄文直译的中译本——《欧根·奥涅金》(吕荧译)由希望社在重庆出版。相较于前一个译本,吕荧译本在质量和内容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首先是译文的内容更加全面,译者参照1887年彼得堡A. S. 苏伏林(A. S. Suvorin)版和苏联科学院编辑1937年版的《普希金全集》增加了《奥涅金的旅行片段》和1830年未出版的第十章。附录部分有《普式庚论〈欧根·奥涅金〉札记》和《〈欧根·奥涅金〉小史》论述了《奥涅金》的成书过程和创作背景,帮助读者增进对本书的理解,更

① 如《上尉的女儿》(有戢翼翠的《俄国情史》、安寿颐的《甲必丹之女》二种译本)、《驿站长》(沈颖的《驿站监察吏》)、《暴风雪》(沈颖的《雪媒》)等等,还有赵诚之译的《普希金小说集》由亚东图书出版,实际上是《别尔金小说集》。

好地体验诗歌的艺术美。其次是译者对待翻译的态度十分认真，他不仅追求语言准确性，并且要求自己要对原著有较深的理解体会，以期翻译出普希金诗歌的精髓。译者在着手翻译《欧根·奥涅金》之前，重读了普希金的作品和苏联对外协会1939年编辑的有关普希金的论文，“希望对这位世界的诗人底气质、艺术、风格能有一个比较具体比较深切的体认”。<sup>[7](391)</sup>此外，为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译者增加了大篇幅的译注。

从1937年到1947年，可以看作是普希金在华译介的第一个繁荣期，除了翻译界的零的突破，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普希金的评论性文章和年谱，而对《奥涅金》的解读主要着眼于其现实主义特色和主人公所具有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奥涅金的评价被反复引用：“普希庚创造了奥涅根和达蒂耶娜的两个典型……显现着俄罗斯过去与现在，同时，也是暗示着包藏了无比美丽的特性的未来”<sup>[8]</sup>“普希庚在此创造了奥尼金和泰契耶娜两个典型……写出了俄国文明史上的一个时代，与深入于这时代的民族心理”，<sup>[9]</sup>而现实主义的典型性的落脚点的意义则是在于与中国社会之联系。普希金作品中所表现的旧式俄国国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当时所处的半封建社会有类似之处，而普希金诗歌中所展现的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对专制制度的抨击恰恰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诉求。当时的苏联社会已经比普希金的旧式俄国社会更进了一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即左翼知识分子心中自由民主的国度。知识分子在阅读《奥涅金》之时，更多的是抱着“前车之鉴”的心态，以学习的态度接受着文学美的同时，憧憬着兴建自由国度的梦想。这种希望常常在对《奥涅金》的评论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我们现在来纪念普希庚的百年忌，更应该不忘却虽然不是为普希庚所开拓的，但多少是指示出了一点光明的未来，而得有今日那样光辉的成绩的苏联。”<sup>[9](52)</sup>

回顾建国前的《奥涅金》在中国的译介，晚清至五四时期，《奥涅金》的译著尚未出现，但在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及文学评论中，中国读者已开始认识到这部书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内容。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片段化的节译，到40年代，随着两部译著的出现，《奥涅金》一书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

## 二、建国后至“文革”时期：译介的高潮和低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苏俄文学的奠基作家普希金获得了极度的关注，并成为歌颂自由解放的精神偶像。1949年是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北平市文艺界在建国东堂举行大型纪念会，当时北平的著名文艺界人士，包括茅盾、郑振铎、田汉、周扬、柯仲平、胡风、郭沫若等人，都到会参加。同月，艾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俄罗斯人民的普希金》，在诗中普希金成了爱国、爱人民，憎恶暴君的英雄人物，诗人将他的不屈精神与俄罗斯的解放、苏维埃的建立联系起来。柯仲平的《歌唱人民天才普希金》则将普希金称之为“俄罗斯人民的英雄气概”。诗人所歌颂的向往自由勇敢的俄罗斯人民实际上是抗战刚胜利的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的中国人民的缩影。胡风曾在《A. S. 普希金与中国》中提出中国人对普希金的精神偶像化实际上是背离作家的真实生活，但恰恰也是因为这一解读，普希金“作为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被中国读者所认识，被当作了“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sup>[10]</sup>普希金的诗歌因获得了与中国的现状相联系的媒介而本土化了。这种偶像化的接受模式极大地带动了普希金在中国的译介，并鼓励了更多的青少年读者加入到阅读的行列。虽然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偶像化确实是对诗人片面的接受，但这一“误解”却激发了一代人对普希金以及俄国文学作品的热爱，《奥涅金》一书也相应获得了热烈的欢迎。

1950年，海燕出版社再版了吕荧1944年的《欧根·奥涅金》译本。1954年，吕荧参照苏联国家文艺出版局1949年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和苏联科学院1950年编辑的《普希金全集（10卷本）》重新完善了自己的译本。这一版本延续了吕荧一贯的严谨专研的翻译风格，文法更加缜密，同时译者将原译名《欧根·奥涅金》更改为更贴近原文俄文读音的译名：《叶普盖尼·奥涅金》。



同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由查良铮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三部长诗单行本,《普希金抒情诗集》以及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如此大范围密集的普希金诗歌译介在中国社会造成新一轮普希金冲击波,一时间,数以万计的读者争相阅读普希金的诗歌。随着中苏交往和学习俄文热潮的来临,一股喜爱普希金作品的热流在中国大地滚动,尤其是普希金的名作《奥涅金》:“那时图书馆里张贴着普希金的肖像……偶尔也有初恋中的女生,站在窗前,用俄文默念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似乎就是那位痴情的少女,在幻想中献出一片赤诚的思念。”<sup>[10](250)</sup> 普希金的诗歌成为了当时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之歌,也成为青年们争相阅读的流行读物。从1954年到1958年的5年间,查良铮共出版译著17本,其中7本都是普希金诗作,而他的《欧根·奥涅金》自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也不断再版:195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仅隔一年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查译版《欧根·奥涅金》语言严谨流畅,诗意浓郁,深受读者的喜爱,风靡一时。周钰良称赞查译语言质朴自然,“读起来几乎不觉得是翻译作品”,<sup>[11]</sup> 剑平认为其译文语言平易生动,最接近普希金的原著,充满诗的激情,给读者以美的享受。<sup>[12]</sup> 查良铮译诗的原则绝不是“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构”死板地忠于原著,而是“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达出来”,为了表现原诗的主要精神,在细节上可以自由大胆些。<sup>[13]</sup> 查在译后记中说,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害怕不能保证译文质量,而悬着一颗心,另一方面则有“一种创造性的喜悦”,<sup>[14]</sup> 他并不拘于原诗行行押韵的规则,发挥了汉语的长处,使用整齐但稀疏的韵脚,构造出独特的诗歌韵律。尽管其后新译本层出不穷,但查译版《欧根·奥涅金》则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和译者鲜明的翻译个性而在翻译史中独占一隅。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奥涅金》的某些译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奥涅金》的译介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期。1955年,吕荧被定性为“胡风分子”,隔离审查,最后被折磨至死。同年,查良铮成为南开大学“肃反运动”思想改造的对象,1959年,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王智量于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参加劳动改造,其中有一条罪名即是翻译《奥涅金》。<sup>①</sup> 虽然如此,但一些坚持理想的译者仍旧继续着他们的创作与翻译。期间,查良铮在面对揪斗、抄家、劳改等不公正待遇时,他都不曾间断自己译诗的工作,虽然他明知译诗没有出版的可能,但他“出牛棚回家以后,立即拿出已经出版的译诗一字一句对照”。<sup>[15]</sup> 因为政治原因,曾经的穆旦已不能再写诗,因而查良铮将所有的情感和才华都放在了译诗上。1977年,查因腿伤,在家休养一年,期间他用更加贴近原文“奥涅金诗节”的韵式修改译稿,使其形式更加流畅严谨,但这一大胆试验只进行到前四章,后突发心脏病,他中断了这项工作,这一版本后来在1983年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奥涅金》译本所凝聚的是他无言的奉献。而对王智量来说,翻译《奥涅金》让他感到“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明”。他在干农活之余,将《奥涅金》的译文抄在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小本本上,这些纸片和小本本后来就成为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sup>[16]</sup> 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田国彬等人,田国彬的《奥涅金》译本初稿实际上在1965年年底已经完成,正当与出版社洽商出版事宜时发生了“文革”,结果这部译稿与其他普希金的译稿一起在1970年去干校的途中全部丢失,但他仍不放弃翻译,一直坚持。到2003年,他的译本最终出版。回顾这段译介史,这一批译者在动乱之中坚持下来的不仅仅是《奥涅金》的翻译,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捍卫文化遗产、积极面对逆境的精神。

即使在那个灰暗年代,普希金也能够给当时的读者带来继续生活和努力的希望与力量。邵燕祥曾回忆在“文革”期间《奥涅金》带给他的心灵慰藉:“在1966年冬天,我和一些伙伴被押着列队外出劳动,走过钓鱼台,玉渊潭水结了层薄冰……我望一眼湖面,忽然想到了《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冰上嬉戏的乡村冬景,依稀是一片笑语欢声。在那不自由的日子里普希金仍旧给我带来一刻的温慰。”<sup>[10](200)</sup> 赵丽宏也

① 当时有人为王智量画了一幅漫画:他躺在棺材里,手上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

回忆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不顺心的阴郁的日子里，每读普希金的诗，都能获得一种安慰以及超然的宁静。”<sup>[10] (389)</sup>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普希金形象，对于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普希金的诗歌不仅仅是艺术美的化身，同时也象征着人们对那个时代交织的复杂情感。

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奥涅金》译介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由繁荣转向低谷。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所建立的对普希金精神偶像的塑造，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片面化理解诗人作品的倾向，但实际上也带来了普希金作品的普及。即使在精神自由受到控制的译介低谷期，普希金仍然为读者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自由的空间，这种“普希金情结”的产生，为下一阶段普希金翻译热潮作了铺垫。

### 三、改革开放至今：译介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后，文学热情推动了文学译介前所未有的繁荣，普希金在中国的传播也呈现了空前的活跃。据笔者统计，上世纪80年代集中介绍普希金的书籍达72本，90年代则增长到154本，至21世纪前10年激增至287本，2011年至2014年6月前已达103本，<sup>①</sup> 出版物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可见中国读者对普希金作品的持续热情。就普希金作品的译介来看，翻译规模扩大，译本数量和种类激增，译者队伍壮大，译介内容和范围辐射至作家作品的外围评论及与之有关的衍生作品。普希金的抒情诗仍旧是最受欢迎、版本最多的作品门类，译本主要包括查良铮的《普希金抒情诗选》、戈宝权和王守仁主编的《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李湛秋的《普希金抒情诗选》等几十种；普希金的小说译本数量众多，主要包括戴启篁的《普希金小说集》、冯春的《驿站长》等。翻译的内容也从少数几个门类扩展到几乎涵盖普希金作品的各个方面，从单一的诗歌、小说、戏剧到翻译普希金的自传（蒯文岱编《普希金自传》）、散文（谢天振译《普希金散文选》）、文论（张铁夫、黄弗同译《普希金论文学》）等。这样辐射面广、大规模的译介在此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读者得以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普希金。

除了译本数量激增和种类增多之外，普希金的译介在新时期的译介也呈现了系统化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关注普希金作品的完整性，以期对其整个思想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因此，90年代后，普希金多卷本作品集就应运而生了，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戈宝权、王守仁主编）；1997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集普希金文集（刘湛秋主编）；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卷集《普希金文集》（卢永选编）；1997年肖马、吴迪主编的《普希金全集》八卷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冯春译的《普希金文集》（十卷本）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1999年刘文飞主编的《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沈念驹、吴笛主编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无疑，在这些普希金全集中，《奥涅金》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译介热潮下，《奥涅金》也受到译者们的极度关注与重视，从1981年至今，先后出现十多种译本，其中不少译本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奥涅金在中国传播的繁荣的新时期。

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士燮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这一译本是新时期的第一个译本，相对比于之前的吕荧、查良铮的译本，该译本主要追求同原作之间的近似关系，译者在译序中表示，自己从形式上，包括诗体（十四行格律诗）、节奏（以四顿为主）、韵脚（每节一韵到底，二四六分明）和语言上（庄严浅白，明白流畅）都追求与原作达到近似，在翻译时“首先考虑忠实传达作者原意”。<sup>[17]</sup> 相隔一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冯春译本《叶夫根尼·奥涅金》则与王士燮版大相径庭。冯春译本主要追求的是更好地表达原著的精神，即“神似”，译者在译后记中说自己在本书中采取

① 主要统计有关集中介绍普希金的文论，传记；普希金作品译本等。入选普希金少量作品的作品集或无专章介绍普希金的文论等都不在统计之列。

的是“比较自由的方式,适当注意节奏和音韵,主要要求通顺流畅,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严格”。<sup>[18]</sup>实际在译诗时他主要采用了多种十四行诗的表现手法,将诗行按意义划分为“四四四二、四四三三、四三三三”等结构,并吸收了汉诗双行押韵的手法。1985年智量的译本《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最大特点则是对“奥涅金诗节”的创新式翻译,译者希望能在内容上力求忠实之外,还应该让中国读者体会到奥涅金诗节的风味。译者在参考查良铮和吕荧译本的前提下,创新地保持了原诗的押韵规律,并在每一诗行中尽量做到四个相对的停顿,以模仿俄诗中的四个音步。<sup>[19]</sup>而丁鲁版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则期望“用另一条路子”来译西洋格律诗,并通过这次的翻译实验,“建立起现代汉语格律诗节奏单位的统一模式”。<sup>[20]</sup>译者放弃对复韵的复制,转而采用中国传统的单韵来体现十四行诗的内部结构:用平仄来处理韵调的配置,按音长来处理诗行的节奏。这种强调本国语言特点的民族化译法是《奥涅金》在中国本土化的又一尝试,对我国白话诗的建设也有积极作用。顾蕴璞和范红的译本也别具一格,译者全部移植了“奥涅金诗节”的原韵,并将每行的四个(阳韵)或四个半(阴韵)的抑扬格音步移植为汉语的四顿。而译者在译序中所作32行长诗《为什么我也复译〈奥涅金〉?》写出了世纪之交《奥涅金》译者们各显神通、勇攀高峰的勇气和期望。译者谦虚地表示自己译这部已拥有许多优秀译本的《奥涅金》,可能要背负上“费力不讨好的风险”,可是“一场接力赛把我吸引,功不可没啊/吕荧和查良铮,又有智量、王士燮和冯春”,<sup>[21]</sup>这种不满足于现状,努力争取新高峰的期望正是鞭策着一代代学者们前进的动力源泉。进入21世纪后,田国彬的译本贯彻了他本人“翻译是再创造”、“要忠于原文,高于原文”、“兼顾两种语言的异同”等翻译原则,<sup>[22]</sup>主要采用符合汉语表达的翻译模式:在音韵方面,用汉语一韵到底的表达方式;在词序和句子结构方面按照汉语习惯对原文作了改动。而剑平的译本则以现代口语入诗,译文押韵自然,并且“忠实于原文,译文贴近原著,准确度高,订正了之前译本的一些误译”。<sup>[23]</sup>曾冲明和曾凡华的译本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作为基准,认为《奥涅金》翻译首要是要做到“信”,即忠实于原文,必须在此基础上再追求其他语言形式和修辞:“首先还是要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特别是政治抒情诗、史诗和《叶普盖尼·奥涅金》这样的叙事长诗,就更要忠实于包括理论观点、历史事实、故事情节等在内的思想内容了。”<sup>[24]</sup>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译本外,新时期《奥涅金》的译本还包括:1993年未余和俊邦的译本,收入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戈宝权、王守仁主编的《普希金抒情诗全集》(第4卷);1995年王志耕的译本,选入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诗选》;2000年郑铮的译本,选入刘湛秋主编的《普希金诗歌精选》,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马国骏和赵艳霞的译本,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刘宗次的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译本也都各具特色。

新时期的《奥涅金》译介不仅仅限于新译本的推陈出新上,研究者们开始利用新手段、新材料、新视角突破现有接受和解读模式,其接受角度也呈多元化的倾向。新时期的研究者主要从下列两个大方向展开研究:

一是“本体论”方向,研究这部著作本身的特色:例如从形象学角度,分析主人公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或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多余人”概念作进一步探讨,将主人公奥涅金形象同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贾宝玉、方鸿渐、涓生等)进行对比。<sup>①</sup>另外,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形象问题也是研究热

① 见:潘一禾.读解奥涅金的被“拒绝”——兼谈“多余人”形象的重新评价[J].文艺理论研究,1997,(1):71-77.;匡兴.对奥涅金形象典型性质的再认识[J].俄罗斯文艺,1999,(2):94-97.刘奉光.是中间人物,不是“多余的人”——谈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的社会意义[J].齐鲁学刊,1986,(2):112-113.吴邦文.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77-84.;董艳君.“多余人”的艺术魅力——以对奥涅金与方鸿渐的比较为例[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3,(1):123-126.;王小璜.涓生与奥涅金形象比较谈[J].中国文学研究,1997,(2):85-88.



点,研究者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代表意义,挖掘普希金的女性观;<sup>①</sup>从叙事学角度,对《奥涅金》的叙事主体、叙事视角等进行探讨;<sup>②</sup>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奥涅金》对俄国诗歌史修辞的贡献等等。<sup>③</sup>这方面的重要学术著作包括陈训明的《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1993年),查晓燕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2001年),刘文飞的《阅读普希金》(2002年),张铁夫的普希金系列著作《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2004年)、《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2004年)郭家申的《普希金的爱情诗和他的情感世界》(2012年)等。

二是从译介学角度:评论诸汉译版本的得失,总结译介经验,探究如何用中文译外国诗,解读译介热潮背后的文化意义。<sup>④</sup>俄苏文学的汉译历程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汉译也成为翻译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近年来也有许多新作问世:如张铁夫《普希金与中国》(2000年)、《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2009年),采取以人物为主线的结构,列举了各翻译家与普希金作品的联系,勾勒出普希金中译史的轮廓;2005年,孟昭毅和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论及《奥涅金》的汉译和普希金的主要汉译者(戈宝权、冯春等);同年,戴天恩编著的《百年书影:普希金作品中译本1903-2000》简要介绍了普希金中译本的出版情况,并附书籍封面;2009年,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丛书有三四十年代俄苏卷,集中探讨了特定历史时期下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文学史著作;2011年,陈建华编著《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依托丰富的史料,对若干重要期刊、著名翻译家和重要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丰富复杂的历史层面;同年,曾思艺所著《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论述了《奥涅金》各个汉译本之间的差异和原因。而这类汉译史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展现了《奥涅金》这部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奥涅金》一书庞大的译本数量和丰富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在中国的经典地位。进入21世纪之后,这部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呈现出了市场化和普及化的倾向。2003年,教育部公布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普希金的诗歌列为推荐课外读物,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其不衰的经典地位,同时也对普希金在中国进一步地普及,培养青少年读者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出版的众多不同类型以中学教育为目标的普及性读物,如:《语文新课标分级阅读丛书:普希金诗选(无障碍导读版)》(钱理群主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语文基础阅读丛书:高中生必读名家诗作》(秋名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中学生诵读一生的诗歌》(袁英选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普希金诗选:名师导读美绘版》(陈慧编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普希金诗选》(宋璐璐,杜刚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版)、《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的故事》(黄艾艾著,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普希金诗歌、小说诠释与解读》(闫微编著,北京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这些读

① 如:黄海宁.对《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形象的再认识[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70-372.周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叶甫盖尼·奥涅金》看普希金的女性观[J].江西社会科学,2004,(8):106-108.孙金美.解读达吉雅娜的形象——重读《叶甫盖尼·奥涅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74-79.

② 如:张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内涵语码分析[J].外国语言文学,2011,(3):199-205.彭甄.《叶甫盖尼·奥涅金》:叙事者形象分析[J].国外文学,2000,(2):111-113.

③ 王加兴.试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修辞手法“换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113-117.赵红.从话语归属看《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修辞特点[J].外语研究,2003,(5):9-13.

④ 如:赵红.论诗体小说长句和短句的翻译——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J].外语教学,2008,(2):85-88.;剑平.从译诗技巧的角度探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的语言锤炼——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而作[J].国外文学,1999,(2):50-57.;杨怀玉.《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J].外国文学,1998,(4):7-12.;戈宝权.《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谈普希金的名著的六种中文译本[J].中国翻译,1990,(4):2-6.

物往往以引导青少年的良好的阅读习惯,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为主要目标,配合名师深入浅出的评论文章和较大篇幅的插图,简明扼要地介绍普希金的生平、艺术特色、写作背景等等,以期使青少年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充分体会阅读文学名著,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格的提升。在泛娱乐化时代,快餐文化正在逐步蚕食人们阅读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培养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将有利于经典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

## 参考文献:

- [1] 维·格·别林斯基,王智量.论《叶甫盖尼·奥涅金》[J].文艺理论研究,1980(1):209.
- [2]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5-86.
- [3] 蒋光慈.俄罗斯文学[M].上海:创造社会,1927:157-159.
- [4] 孙良工.世界文学家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26:72.
- [5] 查士元,查士骥.世界诗歌名著提要[M].上海:新文化学会,1928:1-8.
- [6] 张铁夫.普希金与中国[M].长沙:岳麓书社,2000:32.
- [7] 普式庚著.吕荧译.欧根·奥涅金[M].重庆:希望社,1947:385-391.
- [8] 李春潮.关于普式庚的“犹根·奥涅根”[J].诗歌生活,1936(2):78-83.
- [9] 白木.普希庚百年祭特辑:读欧根·奥尼金[J].苏俄评论,1937(11):42-52.
- [10] 孙绳武,卢永福.普希金与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12.
- [11] 周钰良.穆旦的诗和译诗[A].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8):311-312.
- [12] 剑平.从译诗技巧的角度探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的语言锤炼——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而作[J].国外文学,1999(2):50-57.
- [13] 查良铮.谈译诗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1):34.
- [14] 欧根·奥涅金[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252.
- [15] 欧根·奥涅金[M].查良铮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38-340.
- [16] 王智量.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8-26.
- [17] 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M].王士燮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4.
- [18]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308.
- [19] 普希金.智量译.普希金选集:叶甫盖尼·奥涅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39.
- [20] 亚·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丁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6-15.
- [21] 叶甫盖尼·奥涅金[A].顾蕴璞,范红译.刘文飞.普希金全集(第5卷,长诗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3.
- [22] 叶甫盖尼·奥涅金[M].田国彬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382-389.
- [23] 叶甫盖尼·奥涅金[M].剑平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4.
- [24] 叶甫盖尼·奥涅金[A].曾冲明,曾凡华译.曾冲明,曾凡华.普希金精选集[C].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452.